

■我的文学观



□陈萨日娜(蒙古族)

## 写作是抵抗遗忘的方式

陈萨日娜,1982年生于内蒙古科尔沁,蒙古族。小说见于《小说选刊》《民族文学》《青年文学》《上海文学》《草原》《长江文艺·好小说》《花的原野》《朝洛蒙》等杂志。中短篇小说集《放生》入选2022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

小时候,我们家跟大舅家走得最近。阿爸是民办教师,挣的钱不多,工作却不少,这样一来,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落在了阿妈肩上。大舅就阿妈一个妹妹,看阿妈一个人在地里干活,他心疼得不行。他把自家地里的活儿干完了,就会来帮阿妈干活;甚至有时候他会先帮阿妈干完地里的活儿,才干自家的活儿。大舅来我家帮忙,表兄妹也跟着来。大人干大活儿,小孩干小活儿,边干活边玩耍,轻松又热闹。

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两间房那么长的大炕上只有我一人。我左看看右看看,没有看到大人,也不见兄弟姐妹,整个屋子空空荡荡。我赤脚跑出去房前屋后地找,还是没有人。我哭了起来。我知道去大舅家准能看见阿妈和兄弟姐妹。我家门前有一片草地,草地中间有个水泡子。水泡子很深,有时候会淹死一些小动物。呼日乐(他是个傻子,总是久久地盯着太阳自言自语)拿着长长的木棍坐在水泡子边放猪。呼日乐有时候追打他的猪,也追打路过的小孩。

大舅家在草地那头。我得经过草地、绕过水泡子、躲过呼日乐才能到大舅家。我哪儿有那个胆量。我一个劲儿地哭。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只感到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

快到中午的时候,阿妈和姐妹们才回来。她们都很兴奋,争先恐后地告诉我大舅搬走了,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他们还七嘴八舌地说送别时的种

## 创作源于热爱与坚守

□我本疯狂(瑶族)

我和很多网络作家一样,文学创作始于兴趣。我从2005年开始进行网络文学创作,到现在已经20年了,总共创作了十几部作品,字数将近3000万字。我的第一部作品前面十几万字是手写,写了好几个笔记本,然后用同学的电脑敲到Word文档上面。这部作品与当时的原创文学网站幻剑书盟签约,给了200多块钱稿费,这让我非常激动。那也是我记得最深刻的一笔稿费。2006年,我开始创作我的第二部作品,这时候我的作品有了一定人气,每个月能赚五六千块钱。从那时起,我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基本来源于写书,我很少再跟家里要钱。2009年,我大学毕业,当时很想专职写作,但由于网络文学远没有现在这样繁荣,网络作家这个行业不被世人所认可,所以我的父母并未同意我这个决定。

毕业后,我来到兰州铁路局下属的工程公司工作。工程公司的工作很忙,我经常要深入施工现场,这对我的创作造成了很大影响。2009年冬天,我实习的施工现场在荒郊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生活和工作环境十分恶劣。项目部的住处没有网络,我每天在工作结束后进行创作,然后用U盘拷贝创作内容,等第二天中午吃完饭后再坐汽车去20公里外的镇子,找电脑更新。整整两个月都是如此,从未间断。当时,公司领导问我,为什么在这种情形下都不放弃写作?我告诉他,因为我喜欢创作,想通过创作改变我的生活。

2011年,公司承接了一项重要工程,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按期完成施工任务,公司决定进行两个月的“会战”。那段时期,公司全员基本都在项目部,我们每天早上

6点30分起床,7点集体吃早餐,然后前往施工现场,中午除了吃饭不休息,晚上吃完饭后还要召开当天的施工总结会,等回到住处,基本晚上10点以后了。我每天工作完筋疲力尽,但还是坚持创作,因此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我有几次半夜靠在椅子上思考情节时,直接睡着了。在我的创作生涯中,那段时期是最艰难的,也是收获最大的。既然我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能坚持创作,那我这辈子都不会放弃写作。

我在铁路系统工作了8个年头。在那8年里,我尽力让工作和创作保持平衡,每一项都争取做到最好。2017年,我在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和较大上升空间的时候选择了全职创作,这令家人、领导、同事和朋友都很震惊。但这一次,我很坚决。那份坚决,来源于我对网文创作的相信与热爱。

2019年,为了纪念8年的铁路生活,抒写那些印在我脑海里的的人和事,我萌生了创作《铁骨铮铮》的念头。作品从构思到创作历时两年,很多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来源于现实,多数是我以同事的工作经历改编的。这些人中,既有奋斗在一线的铁路职工、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有包工头、农民工。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时至今日,我依旧记得他们的样子。小说中,王忠国患有胃癌,但是为了完成人生最后的愿望,他参与宁西高铁建设,采取了保守治疗,最终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现实里,我曾带着父亲奔赴各大医院治疗癌症,研究过许多关于癌症的学术报告,在后期,我甚至可以做到用专业术语与医生交流父亲的病情,对癌症的相关知识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这一切,都为我塑造王忠国这个人物奠定了坚实的基

过很多,那片草原上的人也就跟着经历了那些灾难。为了生活,人们总能经受住各种考验。

后来,我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了草原。回想往事,如果没有农区的那些过往,我的童年是个空壳;如果没有牧区的很多遭遇,我的少年是个空壳;如果没有那些感动、委屈或者艰难、快乐,我的成长是个空壳。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写作成了一种证明。写作让我再次经历那些过往。也许我写的不是我的人生,但是,虚构的人生更让我着迷,更让我充实。用真实或者虚构的“真实”证明我的人生、我的过往、我的存在,这让我感到充盈。

有一年,我们一家人一起回农区老家。我们耕种过的土地被收回了,我们的老房子被推倒了,我们门前的水泡子消失了,水泡子边放猪的呼日乐去世了,我们生活过的痕迹完全不见了。我执意寻找小时候祭拜过的敖包淖尔,但是一路寻找愣是没有找到。像镜子一样明净的湖泊——敖包淖尔干涸了。我们耕种过的土地不能证明我们的存在。我们祭拜过的敖包淖尔也不能证明我们的存在。那什么能证明我们的存在呢?我再次深深地感觉到孤独。

很多事物都在消失,都在改变。很多事物的出现有它的道理和意义,很多事物的消失也有它的道理和意义。好在我们有记忆。我们还可以靠文字把记忆记录下来。这时候,我觉得写作是一种记录世界的方式,是一种抵抗遗忘的方式。这种抵抗遗忘的书写是一种重生,也是一种回归。



我本疯狂,本名赵磊,1988年生于湖南东安,瑶族。作品发表于网络文学平台,部分作品实体出版、改编有声剧和影视剧,获中华文学基金会第五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新人奖提名奖。作品入选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新时代十年百部中国网络小说榜、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优秀影视IP作品”

础。有人曾说,作家笔下的故事要感动读者,首先要感动自己。我在创作《铁骨铮铮》时,红着眼、含着泪写完了王忠国去世的那一段情节。《铁骨铮铮》成了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让我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网络文学作家未来的创作方向。

历经20余年的发展,网络文学已成为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作者数量和作品体量上逐步形成广阔的“平原”。随着行业愈加规范成熟和更多优秀作品的涌现,网络文学也将筑就自己的“高原”乃至“高峰”。我作为其中的一个参与者,与有荣焉。

2000年的夏天,黔东南松桃县城一隅,一个女孩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19岁的她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搭上“包分配”的末班车,走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她个子小小的,站在学生中与其说是老师,不妨说是那帮山里孩子的大姐姐。这天她趁周末闲暇,攥着一小叠信纸来到东风路的一家打印店,想让打字员把那些写着她青春迷惘的钢笔字变成规整硬朗的电脑铅字。

隔天去取回信纸和打印好的文稿时,打字员对她说:“这是你自己的作品吗?写得蛮感人的哩,可以向《松桃文学》投稿呀。”

“《松桃文学》是什么?”“是松桃文联办的一本文学刊物,每一期都拿到我们店给排版印刷。”

“文联又是什么?”“是一家文化单位,就在对面楼上。”

就这样误打误撞,她知道了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联”。在这些尚未发生之前,在苗寨出生长大、只知苗俗的她怎么可能想到,多年之后她竟会运用汉字写作,做一个成为作家的梦呢?

她的母亲是村里最会讲故事的人。在田野里,在山林中,在火炉旁,在小河边,母亲讲述的故事像一只只闪着星光的蝴蝶,点缀了它的梦。会扇金子的鱼,一摇就掉落钱币的柏树,化身娇俏少女悄悄给后生煮饭的田螺,想要员外家漂亮女儿的癞蛤蟆,蜕皮后竟是美男子的金蛇郎君,还有那些鲜活得犹如就在身边的树宛妈妈、阿方、阿曼阿囊、千里眼顺风耳……这些故事让她忍俊不禁,让她叹惜落泪,让她无限神往,陪伴了她整个童年。很多年以后她才知道,苗族人没有文字,苗绣是他们美丽的“无字之书”,苗歌是他们炽热的诗歌,一代代口口相传的故事、传说、祭辞则是他们千百年的文学作品与族群记忆。

1988年的秋天,6岁多的她跟随父亲到其任教的一所山村小学上学。在那间大家亲切地称之为“豆豉班”的木屋教室,她与一群全然陌生的孩子开始接受教育。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她很快听懂了老师用汉语讲授的教学内容,并能用汉语和班里的汉族同学交流,有时还教他们讲一些简单的苗语。

识字后,她本能地、如饥似渴地、毫不挑拣地阅读起当时能遇到的所有书籍。学校没有图书室,家里为数不多的连环画已被她翻烂,父亲订阅的《小学生作文》小半天就能看完,幸运的是有爱书人士就在附近,她成了他家的常客。她经常去他家借书,有时他们家没人,或是等不及他看完,她就悄悄推开虚掩的门,把他总是放在枕头下面的书悄悄拿走,赶紧看完又悄悄放回。他知错不认是,却从不责怪、追索。小学毕业以后,她再没去过那人家里,但那些曾经读过的书,以及小时妈妈讲过的故事,自然而然在她的记忆里扎根,直到某一天,像雨后生出蘑菇那样,一个又一个迸发出来,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她的笔下。

后来的一切像蝴蝶效应。一朵朵属于她的“小蘑菇”出现在《松桃文学》《黔东南作家》《铜仁日报》《贵州作家》,再之后是《民族文学》《山西文学》《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她其实并不是一个有文学天份的人,能坚持写到现在,更多靠的是文学前辈与同仁的看重与提携。每当她抬头

## 当命运的文学齿轮转动

□句芒云路(苗族)



句芒云路,本名龙凤碧,1982年生于贵州松桃,苗族,现居铜仁。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4期高研班学员。作品见于《民族文学》《北京文学》《青年文学》《山西文学》等杂志。出版散文集《环佩声处》、儿童文学绘本《聪明的阿方》。获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金贵奖”等

仰望群星闪耀的文学天宇、惶惑无望几欲放弃写作时,总有一些贵人出现,像当年那位爱书人士那样,引导她,激励她。

2013年,她的首篇小说刊发在《民族文学》上,幸运如斯,她似乎应该再接再厉,但她还是写得少、写得慢。她不止一次遭遇写作上的瓶颈,多次想要放弃,但从来是藕断丝连;腐土已广积,菌种已群生。有些作品确实像蘑菇,只要时节、光照、雨水达成默契,就会不受控地拱出来。它们打着小伞,脆弱也坚强,全面柔滑细腻,伞底全是心事的皱褶。

2024年,她有幸赴北京参加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这里,她结识了许多青年作家朋友,大家言谈中传递的信息与温度提振了她的精神,让她耳目一新。她再一次对文学创作有了更深的体悟,同时也终于理解了2018年她在鲁迅文学院大门前看到的8个红漆大字——传承、创造、担当、超越。

创作了这么多年,其中艰辛与不易别人难以知道,可每当她感到无助而想要放弃之时,她总会想起一段话:“我们永远不会受任何消极与虚无无论的影响。尽管人生有许多遗憾,但是面对‘人生如梦’‘沧海一粟’‘意义本无’等说法,我们只能选择更加珍惜和热爱生活 and 文学。和无穷、和永恒相比,哪怕我们近于零,但是和零相比,我们的成绩与可能性也无比地长久与远大。”

自然,我就是当年那个鬼使神差走向文学的女孩,也是那个不断把心事酿成文字的句芒云路,还是那个有着平凡生活、要面对柴米油盐的龙凤碧。

前不久,与一位朋友聊起一事时再次说到“齿轮”,朋友笑道,明明是你转动了命运的齿轮,却说是命运转动了你的齿轮。我顿感讶然。委实,庄公与蝶,作者与作品,文学与生活,谁能切中肯綮地判定谁是主动谁是被动,谁是此谁是彼呢?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距我第一次走进东风路的那家打字店已过去近24年。古人把12年称作“一纪”,那是水星绕地球一周的时间。虚度的、剩余的时光让人惭愧,即将到来的春天则令人憧憬。回望我的创作之路,对于文学与创作,我从来没有真正远离,也从来没有放弃。那些打小就在我心里深种的东西,时机一到,就会蓬勃生发。

钟世华是八桂大地上成长起来的青年批评家。他的批评文字既内蕴执着而蓬勃的文化探寻意识,也彰显出纤敏细腻的艺术感受力,这在《思想深处的漫溯》所收录的文章中有充分的体现。

“地方”如何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进程、如何被文学“现代性”话语整合、如何成为文学史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近来学术界充分讨论的热点话题。“地方路径”视角与区域文化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地方”这一空间具体参与文学实践的方式,而不是如后者那样落脚在地域元素的风格阐发。如学者李怡所言:“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学术史上,我们曾经有过的区域文化研究其实还是国家民族的大视角,区域和地方只不过是国家民族文学的局部表现;而‘地方路径’的提出则是还原‘地方’作为历史主体性的意义,名为‘地方’,实则深究全局性的民族文化精神嬗变的来源和基础,可谓是以‘地方’为方法,以民族文化整体为目的。”钟世华在分析广西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时,就特别注重对他们历史主体性的发掘。在《广西少数民族诗歌的独特诗学精神》一节中,钟世华就用了不少篇幅来讨论“多重文化空间的并置”所造就的广西少数民族诗人特别

的“对话语境”,以及他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一普遍性的诗学话题”时的独特方式。他分析了“南宁诗会”“百越境界”“88新反思”等在广西举行的文学活动与时代文学潮流的关系,并通过《扬子鳄》《自行车》《漆》《凹地》《麻雀》等诗歌民刊的考察,描绘出广西本土诗歌群体对话外界、介入当代新诗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广西少数民族诗歌“通过主体性的建立、多样写作资源的融合等形式”参与到了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成为新时期诗歌咏叹调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声部。

钟世华兼具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审美判断力,在评价诗人时,他既尊重诗人个体的自由和风格,用心体会他们的精神求索和审美想

## 民族性视域下的诗学探寻

——评钟世华《思想深处的漫溯》

□马 兵

象,也尊重他们置身的历史情境,试图触摸时代大潮拨弄下诗人心灵滋长的暗纹。

这些年他一直在做壮族诗人韦其麟的研究,书中收录的《(百鸟衣)的经典建构与影响焦虑》《韦其麟叙事诗中“女性形象”的变迁》两节即是这系列研究的两个成果。钟世华发现“女性形象”在韦其麟叙事诗中占据重要地位,为观察其“创作观念与创造策略的演变与调整”提供了一扇重要窗口。通过对《玫瑰花的故事》《百鸟衣》《凤凰歌》《美丽》《寻找太阳的母亲》等诗作的研读,他将韦其麟叙事诗中的女性分为侧重民族性表达的女性、融入现实话语的“革命女性”和“显露主体意识”的女性三类。坦白说,通过纵向对比、提炼核心主旨、归纳中心意象、做归属分类等都不是什么

有难度的工作,但钟世华的难得之处在于他并非大而化之地来谈,而是深入到诗人的生命经验中。质言之,钟世华的分类是大处着眼,但并不放过小处,尤其关注到了那些无法被大处笼统收编的异质经验,并尝试做出阐释与还原。

我想,钟世华应该是相信特里·伊格尔顿那个著名的说法“诗是修辞性语言的家园”的。在点评盘妙彬、吉小吉、韦佐、郭金世、明素盘等诗人时,钟世华从不强作解人,而是抓取诗人词采俊拔的呈现,通过穿幽入仄的读解,引领读者深入理解这些诗歌的堂奥。

作为已经有一定影响的学林新秀,钟世华最近这些年始终秉持着孜孜以求之心,虚心向学界前辈和同道求教,广采博纳,勤勉不辍。本书第

四章《深入对话空间》,收录的是钟世华和一些著名学者、诗人的对话。乍读起来,这些对话的主体是他访问对象的作答,但话题能引发深度思考,离不开提问者的学养和问题意识。如识者所论,文学访谈是“发展中的文学新类型”“文学的多义、意外的见识,是对话必须具备的,也是文学研究者、文学史所应看到的,这是多主体互动形成的文学新共同体,是独坐书房的批评研究文章难以达到的”。在与张桃洲、张洁宇等学者的对谈中,钟世华的问题既结合了被访谈者的学术专长,又对准当下诗歌创作与批评的若干症候,这样,对谈双方都避免了浮泛的话题空转,谈出了很多真知灼见。而从访谈对象这里获得的启悟又被他充分吸收内化,很好地带动了他个人的学术拓展。

说起来,世华在广西,我在齐鲁,我们二人认识近十年,谋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每次见面,他拉住我讨论文学的热诚都颇令我感动。拉拉杂杂说了几句我对他这本新作的看法,但最想说的是,作为诗人的真诚和热情,还是要读者亲自在他自己的文字中寻找。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